

【军事法学】

军事法体系建构新探

曾志平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 构建军事法体系应当围绕着国家军事权这一逻辑原点来展开。就当前军事法体系研究的情况论, 军事法体系的建构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一是如何正确界定军事法体系的外部边界, 二是如何科学界定军事法体系的内部逻辑边界。一个国家群体的生存安全是设定军事法体系外部边界的逻辑起点。军事法的外部边界决定着军事法的内部界限。确定军事法体系的内部边界, 其实质就是对法律规制的军事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化。军事权的类型是军事法体系内部边界划分的基本依据, 因此, 对军事法律关系类型的研究应该从研究军事权的类型着手。

关键词: 军事法体系; 军事权; 军事权的类型

中图分类号: E2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15(2005) 06-0057-06

军事法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成了军事法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当前军事法体系研究的情况论, 军事法体系的建构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可归纳为两个: 一是如何正确界定军事法体系的外部边界, 二是如何科学界定军事法体系的内部逻辑边界。

一、研究军事法体系的逻辑起点

界定军事法体系的外部边界问题, 其实就是确定哪些与军事有关的社会关系应当纳入军事法的调整范围, 即哪些军事社会关系应受到法律的规制。因为军事活动是以战争为核心展开的, 而战争活动有其自身的特定规律, 而其中一些规律主要是取决于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的问题, 则可以考虑通过法律加以规制。这是讨论军事法外部边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在不是由自然律控制的领域, 哪些是可以或者说应当由法律控制的。这就是我国诸多军事法学著作在军事法概念中涉及的问题——战争的实施与准备中的社会关系, 或称军事领域内的各种社会关系,^{[1](P23)} 或者称军事社会关系。^{[2](P43 213-220)} 至于军事领域内社会关系或曰军事社会关系的范围, 各种著述虽有差别, 但相同之处较多。如有的归纳为五类社会关系, 即国家在国防建设领域里的军事社会关系, 国家在武装力量建设领域里的军事社会关系, 武装力量内部之间的军事

社会关系, 军地、军民之间的军事社会关系, 有关国家在战争、内乱等非常时期和涉外军事事务方面的社会关系。^{[3](P54-57)} 有的也归纳为五类社会关系, 但与前者略有不同, 区别在于第四种和第五种, 分别或称武装力量与外部之间的关系, 称对外军事关系。^{[4](P15-16)} 有的则归纳为四种, 分别是国家在国防建设方面的军事关系, 武装力量建设方面的军事关系, 军地、军民之间的军事关系, 国家在战争、动乱等非常时期和涉外军事事务等方面的军事关系。^{[5](P62-64)} 对此类观点及其具体演绎进行考察, 笔者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各种论述都表现为一种经验式的描述, 而缺乏基于明确的逻辑起点的严格演绎, 更谈不上从事实模型到理论模型的科学归纳。因而, 笔者认为, 谈论军事法的调整范围, 首先必须认清军事法的逻辑起点。

就事实范畴而论, 军事法的逻辑起点显然是军事活动。当我们在法律的视野中讨论军事活动时, 自当认可事实范畴中军事的含义, 但这并不等于法律视野中的军事与事实范畴中的军事是同一的, 即是说, 军事活动并不完全置于法律的规制范围之内, 或者说, 有些军事活动法律并不直接加以规制。譬如, 长期以来人们对军事法的理解只限于军事刑法或者军事处罚法,^{[6](P503)} 这一事实表明, 在各种军事事务

收稿日期: 2005-07-15

作者简介: 曾志平 (1966-), 江西于都人, 原系南昌陆军学院副教授,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人们通常认为法律只有对军事处罚特别是刑罚处罚才加以规制的。并非所有的军事活动都是在法律的规制之下的，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军事社会关系都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所以，明确了军事活动的范围并不等于明确了军事法的调整范围，军事领域的社会关系只有法律规制的那一部分才能成为军事法的调整对象。

前面说到，就事实范畴论，军事法的逻辑起点是军事活动，现在已经明确，军事活动并非全是军事法的规制范围，即是说，就法律的视野看，军事活动已经不能作为军事法的逻辑起点了。那么，军事法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

军事法之作为法，自当服从法的内在逻辑。当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其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在我国这样一个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国家中，所有的国家制度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人民主权，进一步说，应当是对人民主权的保障。在这种法制背景下，军事法的基本使命显然应当是双重的，即一方面要为军队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要担负起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任务。当然，所谓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其实并非说要让军队承担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任务，而是说要通过军事法对军事活动的规制或者说约束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军事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组织武力并运用武力进行对抗的社会活动，其核心是组织和训练一支具有最强的对抗能力的武装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大量地需要各种物质性的社会资源，而专业的军事组织自身又不直接生产任何物质资源，所以必然会在武装力量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发生资源占有与使用的冲突。另一方面，拥有武装力量指挥控制权的主体总免不了会为了自身的利益——特别是自身利益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极端的冲突时——而动用武装力量，即发动战争，如果要求一国或者一个群体的全体成员为这种战争“埋单”，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而产生了武装力量指挥者与不特定社会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两类冲突，概括地说就是军事权与公民权的外部冲突。具体地说，前者是组织与供养武装力量的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后者属于运用武装力量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这两类冲突往往涉及全体公民，因而当属于国家层面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必须由国家法来解决。反映在现代国家制度中，便形成了一个国家军事权问题。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与

宪政的总体背景下，国家权力是需要由法律进行规制的。至此，我们可谓找到了军事活动与国家法律制度的逻辑接点，换言之，法律对军事活动规制的逻辑起点，就在于国家军事权。相应地，军事法与其他部门法——确切地说是其他国家法性质的法律部门，如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公法部门——的边界，以及军事法分支部门之间的边界，也应当遵从军事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边界，以及军事权内部种类划分的边界的规律性。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确定军事法体系内、外部边界的基本思路。

二、确定军事法体系的内、外部边界的基本思路

从其行使的范围描述，国家军事权可以分为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武装力量外部的维度，即发生在武装力量与其他国家机关及一般社会私权主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维度中，军事权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及社会私权主体的权利而出现，在与这些权力或者权利面对面的空间里运行。在国家法律中，这部分军事权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武装力量的供养权，即是否要供养一支武装力量，武装力量是采用常备军的形式还是民军的形式，武装力量究竟要维持多大的规模——包括人员数量、武器装备的质量等级与数量，进一步地，在国防动员体制之下，非军事单位往往要承担部分直接或者间接涉及军事活动的义务，如战备物资的储备，交通、通信资源为军事目的的预留，涉军事目的却又与民用目的不完全匹配的科研开发与生产，学校开设国防知识课、军训课，等等，这些最终都会涉及公民和有关社会组织的负担。依法治原则，这些活动都必须动用法律进行规制。二是动用武装力量的权力即战争发动权或曰宣战权。从国内法的角度论，这属于外部军事权的规定。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虽然也可以说是对国家战争权的限制，但毕竟这种学说带有相当的拟制的成份——特别是当国际政治权力格局失却平衡而沦于强权政治的时候，所以现代国际法关于对战争行为的控制更多的是采用了人道主义的理论，如此，则那些限制战争权、作战行为与手段的国际法原则、制度与规则应当更倾向于作战行为规范的性质——更多地着眼于责任，更多地着眼于作战中的个人。所以，笔者并不认为战争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范属于外部军事权的范畴，而拟将其列于内部军事权的范畴。^[7]

第二个维度是武装力量内部的维度,即发生在武装力量内部的国家军事权与特定的私权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武装力量当局与作为武装力量成员的军人之间的关系——军人虽然主要是个职务的主体,但在武装力量的管理、指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武装力量当局的管理、指挥行为与作为私权主体的军人个人利益的冲突,当这种冲突涉及到军人那部分属于公民基本权利或者称人权的利益时,当然也要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相反,发生在此领域之外的社会关系,譬如某一个具体军事训练课目的具体实施方法、具体战役战斗中战斗队形的运用等问题,更多涉及的是类似于自然规律的把握与应用的问题,自然不宜由法律这种人为的手段直接地进行规制。^①在这种法律规制范围内的军事权,即是发生在武装力量内部的武装力量管理控制权。

关于军事权的外部界限必须由军事组织之外的主体来设定。因为军事组织的暴力集团的性质,如果由军事组织来分配与自身有关的利益或者权力,则一旦发生不公的分配,将不再有其他主体有能力对之进行衡平。然而,又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往往不为普通的私权主体所能自觉体察。由人之自利的第一层次的本性所决定,在不涉及自己能够体察到的——虽然这种利益本质上也属于自身的——利益时,将可能出现某些群体公共利益无人值守的局面——譬如这里所论的军事利益。因此,国家必须为此设定一个底线,即设置军事权的最低限度。这就涉及到军事法的第二个逻辑起点,即军事活动的唯一的积极意义——武力对抗的胜利,最少是不败。由是,即构成了军事法的逻辑底线,即在考虑军事法的外部边界设定时,必须保证组成国家的最基本的目的,一个群体的生存安全。基于前述的这类利益很可能无人值守的情形,此类问题常常被视为政治问题,在技术上通常采用最能体现民主的商谈方式——譬如由最高立法机关依立法程序进行讨论的方式——来解决。^{[8](P768-769)}(这个问题已超出本文的题域,此处不再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军事法的底线在本文中的意义,相反,军事法的底线在本文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决定着军事

法的内部界限,即从军队内部论,所有的军事活动都应当是围绕这一底线展开,这构成了所有发生在军队内部的军事活动规则的逻辑起点。

确定军事法体系的内部边界,其实质就是对于军事法的分支部门进行分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归根结底就是对军事法调整对象的过细分析,换言之,就是要对军事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性质界定,进而对各类军事社会关系加以类型化,简言之,就是对法律规制的军事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化。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讨论,可以从民法、刑法乃至行政法学的成功经验中找到依据。民法、刑法等传统而古老的法律部门所以能达到今日这般成就,离开对民事活动的类型化以及进一步地对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对犯罪行为类型的类型化等最基础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对随着社会活动领域的扩张而出现的新的民事活动、犯罪活动及时予以类型化也保证了这些法律部门的与日俱新。因此,笔者认为,军事法学的研究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对军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研究。非如此,则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军事法具体部门深入研究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还将影响到对整个军事法的基础概念与界限的正确界定,遑论整个军事法基础理论的完美建构。

三、军事权的类型——军事法体系内部边界划分的基本依据

通过对军事法的逻辑起点的研究我们已经认识到,就事实论,军事权是一切军事活动的核心。申言之,在各种军事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围绕着军事权的行使而展开的,没有国家的军事需要就不会有相应的军事权,因此,我们可以说,就法律的逻辑论,军事权是各种军事法律关系展开的逻辑起点。进一步论,军事权的类型其实就构成了军事社会关系的类型。^②因而,笔者认为从研究军事权的类型着手展开对军事法律关系类型的研究或许是一条比较合理的路径。

总体上,从军事权是否运行于武装力量内部论,军事权可以分为外部的军事权与内部的军事权。

(一) 外部军事权。所谓外部的军事权,指的是

^① 在“军事法”的内容中,有许多规定即属于此类性质的规范。此类规范往往不直接产生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在确定某些行为的结果时,却又经常会动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规范,以判断某些行为的正当性。譬如,某些武器的操作规程本身不能算是法律规范,即便违反了一般也不会导致法律责任,但是,当上述违反规程的行为造成了某些法律规定的后果时,这些操作规程便成了判断法律责任的前置性依据。这类规范,笔者称之为技术规范。

^② 有意思的是,当前我国军事法学的教科书中恰恰没有对军事权这一最基础的理论问题作出集中的专门研究。不过在分析他们的整体论述体系之后大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军事权包括军事立法权、军事指挥权和军事司法权。

在武装力量体系之外运行的军事权,包括宣战权、武装力量的征集与维持权以及武装力量行动的支持与协助权。

1. 宣战权。宣战权,或曰战争权,是关于是否动用武装力量介入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的权力。原国家的起源,国家权力的根据,契约论认为,国家乃为止自然状态下这无尽的争杀而产生,国家权力乃为止这种争杀之需要而经由人们之间的契约而形成。战争即为止争杀或曰保护人民免受争杀之苦的一种手段。因而,战争自当为国家之最为原初的一种职能活动,战争权自然也是最为原初的一种国家权力。我国的“兵者,国家大事”之说,正谓此。较有代表性的各国宪法的规定,无不规定战争权或曰宣战权为国家至为重要的权力。并且规定这种权力由最能代表国家主权的国家机关行使,而鲜有规定由武装力量,包括身负武装力量统率权的文职政府首长自身去决定是否介入战争的作法。显然,这种权力当属于外部军事权的范围。对这类军事权的法律制度规定,自然是军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武装力量的征集与维持权。武装力量的征集与维持,指的是征集武装力量,包括组建常备军、征集民军,以及募集武装力量所需的资源以维持武装力量的存续与功能运转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维持国家的武装对抗能力,保证国家的安全与生存所必需的。在常备军组建之前,自当由文官政府实施。即使常备军获组建,也断不能由常备军自己直接以武力或者任何其他手段从社会募集各种资源,否则社会岂有宁日。而民军在平时是不消耗公共资源的,因而对民军的征集自不可由政府任意的命令而为,必须经由法律特别授权方属正当。以上这些行为,都需要依凭依法律设立的国家权力才能实现,并且其间还必须在保证军事活动的底线要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努力保持社会供养能力与军事需要之间的均衡。因而,国家必须对这些活动进行法律的规制。此部分法律规制之下的军事权,自属重要的一类军事权。

3. 武装力量行动的支持与协助权。武装力量虽获组建与维持,然其功能的运行常不免涉及其他的社会主体及其利益,如交通运输设施的使用,军事演习场地的使用与演习时外部秩序的维护,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等,都不宜由武

装力量特别是常备军直接出面解决,而必然需要有关的国家机关予以支持与协助。这类法律规制之下的军事权,也是军事权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 内部军事权。所谓内部军事权,乃指在武装力量内部运行的权力。由于民军在获征召之前实际并不算真正的武装力量成员,因而内部军事权主要是指运行于常备军系统内部的权力。根据对武装力量内部活动的考察,笔者认为内部军事权即指对武装力量的全体成员及其行动的指挥权与管制权,也即我们通常所称的武装力量的统率权。总体论,武装力量的统率权可以分为二部分,即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与管制权。^①

1. 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所谓武装力量的指挥,是指武装力量的指挥机关对武装力量的作战和其他行动的组织领导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由武装力量的暴力集团性质决定,谁拥有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谁便具有最强的对抗能力,继而必然具有最强的竞争社会资源的能力。对这种权力当然要设置完备的配置与制约制度。因而,武装力量的指挥权当然应当归属于法律规制之下的一种国家权力,并且,对这种权力的配置与制约必须由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予以规定。

2. 武装力量的管制权。所谓武装力量的管制权,是指对编入武装力量各组成部分的单位与个人的管理与控制权。军事活动尽管最为重要的是战争,但是最为经常却是平常对武装力量的管理与控制。因此,武装力量的管制权事实上构成了军事权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从各国武装力量的构成情况看,国家在维持常备军的同时普遍地都把民军纳入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而常备军与民军的管理与控制制度显然不同,因而两种武装力量的管理与控制须分别处理。(这里重点论述常备军的管理与控制)根据常备军的一般活动规律,可以将其管理控制活动进行以下分类:

(1) 武装力量体制编制管理权。武装力量的体制,是指武装力量的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包括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划分、相互关系等方面的规定。武装力量的编制,是指武装力量各级各类建制单位的机构设置和人员、装备统配的具体规定,分为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由军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或其授权

^① 对这两类军事权还有另一种称谓,即称为军令权与军政权,分别对应于军事指挥权与武装力量管制权。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p445-446。周健,于恩志,美国军事法[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2,p90-97。

机关制定,经编制表形式颁发。是武装力量编成的法规和建制单位设置、控制定额、配备干部、补充兵员、配发武器装备的准则与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规定)。

(2) 军事训练管理权。指武装力量军事理论教育和作战技能教练的活动。包括部队训练、院校教育、预备役训练等。部队训练的内容,主要包括共同科目、技术、战术、战役法等;训练的形式和方法,主要包括理论教学、图上作业、实物操练、计算机模拟、实兵演习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

(3) 武装力量共同行为管理权。军队通常称其为行政管理,是指常备军对内部日常事务的管理。主要包括:按照共同条令和有关规章制度,建立和保持正规的战备、训练及其他工作与生活秩序,培养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优良的作风,维护良好的内外关系,管好军事资产,做好安全防事故工作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之所以称该部分军事活动为共同行为管理,而不直接沿用军队习称的“行政管理”,首先是因为这部分管理活动的内容针对所有的各级各类军事单位和人员都是共同的。^①其次,如果说因为这些管理活动具有行政的某些特征而称其为行政管理的话,则因为武装力量内部管理的绝大多数活动都具有行政的活动的特征,而使得这种称法在逻辑上出现了混乱。第三,实际上,即使军队的多数活动都具有行政的某些特征,但军事活动还是有许多区别于行政的特性。譬如,行政权的行使通常都是直接指向社会一般私权主体的,而军事活动则大不同,反而正好是一般情况下不直接指向社会一般私权主体的。^②所以,一方面为从称法上区别军事活动与行政活动,另一方面从本质属性上也有必要区别军事活动与行政活动。

(4) 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管理权。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之所以将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从内容上看武装力量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以人事与组织管理为主要内容。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武装力量内部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主要还是经验的性质,从我国武装力量建设的历史事实看,在武装力量中开展政治工作,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并

且经历史证明是一种有效的优秀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正是典型的经验形态。所以,我们应当认可这种活动为武装力量管理的正当内容。

(5) 后勤管理权。简称后勤,是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军事建设和作战需要进行的各种保障工作的统称。分为战略后勤、战役后勤和战术后勤。主要包括后勤保障、后勤防卫、后勤指挥、后勤建设、后勤训练和后勤科研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

(6) 装备管理权。是指为使武器装备得到适时补充、合理使用并保持良好状态而进行的管理。通常是指武器装备从军队接收到退役、报废的一系列管理工作过程。主要包括武器装备的申请、补充、调整、动用、封存、保管、维修、转级、退役、报废和技术革新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

(7) 军职人员渎职惩治权。指对军职人员的渎职行为进行惩治的活动。之所以将此类活动列为一个类型,是因为实质上各种军事处罚应该是一体的。首先,从我国军事法的历史看,从来都不像现在一样区分纪律处分与军职罪的。其次,从纪律处分(包括实质上与此相同的行政看管、劳动教养,它们在实质上都属于行政处罚)的内容看,某些行政处罚的严厉程度实际已与刑罚不再有本质上的差别。第三,从设立纪律处分的目的看,当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给受处分者以改过的机会的意图。但是,从现行纪律处分的程序设置看,由于其申诉程序的缺陷,实际上导致上述意图几乎全然落空。此外,外军也不乏各种军事处罚一体的做法。

(8) 武装力量作战管理权。作战活动应当遵从战争规律,因而人为地预先为作战设定行为规则特别是积极作为类的行动规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中国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人们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总结成指导作战的规则自有其意义。但是,由战争自身的特点决定,预设的作战行为规则往往被证明是不应该具有绝对的束缚力的。所以,笔者认为,最起码积极作为类的作战行为规则的性质应当是指导性的技术规范,不应当成为产生法律责任的直接依据,最多也只能是间接的评判依据,即判断某一作战行为的合理性的依据。但是,战争行动尽管是

① 军队针对这部分内容的法律规范名称上就叫做“共同条令”,具体包括《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警备条令》。

② 这一点几乎构成了军事活动与行政活动的根本区别。对此,笔者拟另做论述。

合理的暴力，其最终目的却是政治性的，即通过战争的方式决出交战双方的权力等级与次序。因而，凡是与此相悖的作战行为都是可以考虑予以禁止的。对这类行为的禁止性规范，即体现为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的规范。因此，笔者主张，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的原则、规则应当归于作战行为法的范畴。其实，违

反战争与武装冲突法规范的法律责任的个人责任原则也可以支持上述结论。

以上即为军事权的类型区分，也可以作为军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区分。以此为依据，即可以构建军事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1] 图门. 军事法学教程 [Z].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钱寿根. 军事法理学 [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
[2] 陈学会. 军事法学 [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张山新. 军事法学 [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3] 陈学会. 军事法学 [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4] 张山新. 军事法学 [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5] 钱寿根. 军事法理学 [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
[6] 周健著. 军事法论纲，海潮出版社，2000. 周健. 中国军事法的传统 [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2.
[7] William Michael Treanor, Fame, the Founding, and the Power to Declare War, 82 Cornell Law Review, 709, 694 (1997).
[8] 田士成. 军事法与战争法之间关系的准确定位 [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0 (4).

[责任编辑：司利芳]

(上接第56页)消除标准上的差异，既有利于实现诉讼时效的价值，又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2. 关于除斥期间。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重大区别之一就在于“诉讼时效属于可变期间，法定条件下司法机关可以延长之，而除斥期间属于不变期间，不可延长。”^[1](P356)]就具体的环境损害来看，诉讼时效为三年，从受害人知道污染损害时起算，其间可因受害人主张债权——要求赔偿或者施害人承诺赔偿而重新计算时效，或者因为法定事由而使诉讼时效中止。但是除斥期间为二十年，从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不以当事人是否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为要件，并且这二十年是连续计算的不中断、不可延长的。

环境损害行为做出后，在环境中会有较长的富集变化的时间才会作用于人，并且损害行为作用于人

后或物后也会有较长的潜伏期，这期间多达数十年（在日本的四起著名公害案件中可以得到证实），而除斥期间的二十年显然过于短暂。“一些学者提出20年的除斥期间对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诉讼可能时间还是短了。比如日本的水俣病事件，从排放污染物到出现水俣病患者，几乎经过半个世纪之久。”^[4](P307)]

因此在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中不要盲目抄袭民法的20年除斥期间，也不要盲目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20年的除斥期间（日本在其大气、水污染防治法中均规定了20年除斥期间）的法条，而应该针对环境损害的特点，结合我国现阶段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权利意识还不强的国情，适当延长除斥期间（笔者建议30—50年），以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

参考文献：

[1] 张俊浩. 民法学原理 [Z].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 王泽鉴. 民法总则 [Z].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 曲格平. 环境与资源法律读本 [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
[4] 常纪文，陈明剑. 环境法总论 [M]. 中国时代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司利芳]